

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
曾偉峯、張弘遠、王韻、林雅鈴、
張登及、黃瓊萩

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

主編

著



一個人或一個時代： 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
／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鍾延麟，蔡文軒，張執中，曾偉峯，張弘遠，王韻，林雅鈴，張登及，黃瓊萩著；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主編。——初版。——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10 面；公分

ISBN 978-626-343-358-8 (平裝)

1. CST: 習近平 2. CST: 政治發展 3. CST: 政治權力 4. CST: 中國大陸研究

570.16

111014533



1PSJ

一個人或一個時代 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

主編 — 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 (5.9)

作者 — 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鍾延麟、蔡文軒
張執中、曾偉峯、張弘遠、王韻、林雅鈴
張登及、黃瓊萩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經理 — 楊士清

總編輯 — 楊秀麗

副總編輯 — 劉靜芬

責任編輯 — 林佳瑩

封面設計 — 王麗娟

出版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網址：<https://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22年10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480元

政治領袖眼中的政治：習近平和他的中國

寇健文

摘要

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是：習近平的政治性格和領導風格具有什麼特徵？這些個人特質如何形成的，特別是跟早年經歷有什麼關聯？本文爬梳習近平早年生活與言行後，分別整理出：1.簡儉樸實和厭惡腐敗；2.隱忍堅持、高度自信；3.念舊重情、除惡必盡；4.崇尚強勢領導、不墨守成規；5.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6.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使命感等六點心理特質。

關鍵詞：中共（中國共產黨）、習近平、政治性格、認知、信念、領導風格

一、前言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說，「作為一位教授，我傾向認為歷史受到非個人力量的主導。但若從實務上看歷史，你會發現不同性格造成的差異。」（Isaacson 1992, 13）個人層次的因素並非影響領導人決策行為的唯一因素，但可以提供解釋過去的線索，以及研判未來的參考。吾人分析政治變遷與政策走向時，不但要掌握國內外環境對領導人決策的結構性限制與助力，也要注意領導人的政治性格（political personality）和領導風格（leadership style）的影響。

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是：習近平的政治性格和領導風格具有什麼特徵？這些個人特質如何形成的，特別是跟早年經歷有什麼關聯？在《人、國家和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一書中，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2001）提出研究國際衝突成因的三個分析層次：個人、國家與國際體系。這三個分析層次分別從領導人個人特質或人類本質、國內政治體制或社會結構、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互動等不同層次探討國與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原因。過去多年以來，國際體系層次一直是分析國際衝突的主要層次。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和全球化的加速，國際關係研究的分析層次出現回落的現象（李巍、王勇 2006, 112-142）。

近年來世界上出現多位性格鮮明、作風獨特的領導人，如普丁（Vladimir Putin）、習近平、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川普（Donald Trump）等。在這幾位領導人當中，習近平最值得吾人優先關注。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以後，他的集權程度和變革作為遠超過外界的想像（Li 2016, 8; Lee 2017, 325-336; Pei 2018, 21-32; Shirk 2018, 29-30）。這個發展背離1980年代以來走向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的方向，包括「集體領導」、「黨政職能分開」、「社會有限多元」等特徵。¹

¹ 藍普頓（David Lampton）也認為中共菁英政治在1978年至2012年之間呈現「缺少支配性領導人」、「較為鬆散的寡頭領導」和「較為多元的官僚政治」。（Lampton 2014）。

習近平集權的現象告訴吾人，過去強調從結構因素解釋中共高層政治的途徑有其不足之處，需要補強。舉例來說，在胡錦濤時代，外界較為強調中共高層政治出現的制度化趨勢，無論是在政治繼承或是決策模式都逐漸出現許多慣例、規則，包括集體領導、年齡劃線離退、任期制、地方歷練、逐級晉升、集體決議、業務分工等。²這些制度制約個別領導人在高層政治中發揮的作用，既帶來政治穩定，也限制政策調整的空間，甚至成為既得利益的保護傘。習近平集權的現象鬆動過去強調結構制約行為者的單向思維，使得外界必須考慮行為者改變結構的可能性與機制，重新檢視個人因素與結構因素對政治變遷的影響。同時，過去當外界聚焦在中共高層政治制度化的時候，較少解釋制度崩解，無法適切回答制度逐漸形成後，制度走向崩解的原因與過程。剖析習近平的政治心理特質能有助於解釋習近平集權的過程、時機、原因與後果。這個研究成果既能增加吾人對制度崩解的理解，又有助於中國研究和比較威權主義研究。

現有文獻不乏深入探討中國大陸的國際環境與國內發展挑戰的作品，但缺少系統分析習近平個人特質的作品，更缺乏將政治心理因素與結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研究成果。目前有關習近平政治性格的作品僅有四篇文章。何凱（Kai He）和馮慧雲（Huiyun Feng）（2013, 209-233）利用操作碼（operational code）比較胡錦濤（2002-2012）和習近平（2007-2012）兩人公開講話（英文版本）中呈現的信念體系，兩人抱持相近的合作世界觀（cooperative worldviews），認為兩人具有相近的哲學和工具性信念（philosophical and instrumental beliefs），因此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的中共外交政策將是延續高於改變。不過，習近平雖是一位對現有國際體系持樂觀態度的現狀領導者，但會更強勢地達到其戰略目標，尤其是在鞏固權力和面對嚴峻的外部壓力時更會如此。

唐學志（Joseph Torigian）（2008, 7-15）檢視習近平早年在文革前後的成長經驗與當時中國大陸的歷史背景之後，歸納出他具有堅忍

² 相關觀點參見寇健文（2010）。

(toughness)、理想主義 (idealism)（相信犧牲奉獻與治國天命的紅二代）、務實主義 (pragmatism)、政治謹慎 (political caution) 等四種性格特質。不過，唐學志並未討論習近平上台後的決策作為是否吻合前述性格特質。

李智琦 (Tony C. Lee) (2018) 根據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公開發言，利用五大性格特質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檢驗他們在性格上的異同。兩人具有相同程度的「外向性」 (extraversion) 和「經驗的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顯示他們都喜歡發展和運用魅力 (charisma)。但兩人在「盡責性」 (conscientiousness)、「親和性」 (agreeableness)、「神經質」 (neuroticism) 三種特質上出現差異，顯示他們在「政治容忍」 (political tolerance) 和「成就感」 (need for achievement) 上有所不同。習近平的政治容忍度稍高於毛澤東，所以可能不會重複毛式的瘋狂個人崇拜與政治鬥爭。同時，習近平的成就感高於毛澤東，顯示前者有更高的自尊與渴望去完成重要目標。

寇健文 (Chien-wen Kou) (2021) 認為習近平的政治性格使得他在社會與黨內氛圍高漲、黨內權力格局無力制約的情境下綜合造成權力再集中的結果。中共在2012年面臨國內外嚴峻挑戰，社會與黨內出現期待強勢領導人解決這些挑戰的氛圍。同時，黨內派系的權力平衡因薄熙來、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等野心集團倒台而發生重大變化。原有多頭馬車的權力格局鬆動，削弱制衡習近平集權的力量。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習近平的政治性格。寇健文針對習近平公開講話中「鬥爭」一詞，進行共現詞分析 (co-occurrence analysis) 與情緒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認為習近平的政治性格具有下列幾個特徵：政治本質為衝突鬥爭的政治認知、民族偉大復興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使命感、在重大議題上不退讓的強勢領導風格。這些性格特質引導習近平偏好權力集中。

本文的論述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第一，政治性格與領導風格影響領導人如何理解政治本質、國內外事務，如何看待政治對手與盟友，如何理解自己的歷史角色，以及如何進行日常的領導工作。這些認知與心理特

質是理解該國決策的必要環節。第二，成長過程中的重大事件影響領導人日後的認知、信念和行事風格，進而影響其決策行為。許多研究領導人決策的文獻都會強調早期經歷的大時代歷史事件與個人重大際遇形塑對日後政治性格的影響。本文將蒐集和檢視習近平早年成長經歷與言行，以及他本人或周邊同事親人如何回顧特定早年遭遇，勾勒出他在政治認知與信念的特徵，作為解釋其決策行為的線索。

本文爬梳習近平早年生活與言行後，分別整理出：1.簡儉樸實和厭惡腐敗；2.隱忍堅持、高度自信；3.念舊重情、除惡必盡；4.崇尚強勢領導、不墨守成規；5.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6.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使命感等六點心理特質。本文第一節是前言，第二節到第七節分述前面所提六點心理特質，最後一節結論綜合討論六點心理特質隱射出的世界觀、歷史觀與行事風格。

二、簡儉樸實、厭惡腐敗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掀起反腐運動，持續打貪已經造成周永康、令計劃、蘇榮、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等數百位副部級或副軍級以上文武幹部遭到查處。本文認為習近平上台後迄今的整風反腐，不只是基於打擊政敵，鞏固權力的政治需要，也反映整飭吏治，建立廉潔政府的政治偏好。肅清政敵是顯而易見的目的，江澤民、胡錦濤上任時都曾以反腐之名，打擊政敵，如陳希同、陳良宇。但如何證明習近平反腐也有整治吏治的目的呢？本文認為，習近平養成這種政治偏好的主要來源有二：第一是家庭環境的影響，第二是青少年時期下鄉到陝北梁家河村的鍛鍊。同時，他就任總書記以後發起的反腐運動，是他職涯中的第三次反腐，之前兩次分別出現在他擔任寧德地委書記和福州市委書記任內。這顯示他在反腐議題上的一致性。

習近平的父母習仲勳和齊心都是生活儉樸的人。習仲勳對子女的家教與品行相當嚴格，因此習近平從小受到革命教育，並保持艱苦的生活習慣

（習仲勳傳編委會 2014, 590-593）。習近平曾提到：「儘管家庭的生活條件比較優越，這麼講吧，就是衣食無憂，但是我父親對我們的要求，使我們過得非常簡樸。……我們本身平常穿的衣服，且不說補丁加補丁，而且都要穿兄弟姐妹的衣服，……我……大部分穿姐姐的衣服花衣服，花鞋子，我絕對不幹，但是也不得不穿。逢年過節了，我們也都去參加一些晚會，……工作人員說這是誰家的孩子這麼破衣襤衫的？知道的就說這是習家的。」（鳳凰網 2009）。多本有關習近平的傳記也提及習仲勳在節儉方面的言傳身教（吳鳴 2008, 28-29；黃怡筠譯、矢板明夫著 2012, 117-118）。

此外，習仲勳作風低調，要求子女不搞特權，也鼓勵子女和身邊隨扈到基層和偏遠地區工作（習仲勳傳編委會 2014, 590-593）。在習仲勳的影響之下，習近平的早年生活跟許多高幹子弟不同，如同為副總理的薄一波家庭就過著奢華的生活（黃怡筠譯、矢板明夫著 2012, 117-118）。習仲勳帶給習近平簡樸作風的示範，可以從習近平致父親的拜壽信內容略知一二。2001年10月15日，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因公務無法參加習仲勳88歲壽宴，於是寫了一封拜壽信。信中提到：「一是學父親做人；二是學父親做事；三是學父親對信仰的執著追求；四是學父親的赤子情懷；五是學父親的簡樸生活。」（習仲勳傳編委會 2014, 594-596）。除了簡樸家風的影響之外，文革期間至陝北梁家河村插隊的經驗也塑造習近平的簡樸作風。梁家河村村民梁有昌用「吃苦耐勞」來形容習近平。在農曆2、3月時：「習近平經常捲起褲管、光著腳，站在刺骨冰水裡幹活，當時社員都評價他是『好後生』。」（央視網 2008）。他因為曾在冬天打井時長時間踩在冰冷泥水中，凍出毛病，日後冬天的時候容易腿疼（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 2017, 173-174）。習近平於2002年受訪時也提到自己下鄉經歷過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等四大關（人民網 2015a）。由此可見，下鄉插隊經驗對習近平的簡樸作風有強化作用。

進入官場後，習近平仍表現出簡樸低調，不重視物質生活的作風。習近平的第一次婚姻（1981-1984）因習近平不願意與妻子柯小明同赴

英國，柯小明也無法忍受鄉下困苦生活條件，最終以離婚收場（林洸耀 2016, 36-38）。1982年到1985年在河北任職期間，習近平「同樣很節儉，下鄉考察，在食堂吃飯，每頓都會付糧票，從不白吃白喝。……他的床鋪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兩條長凳支起一塊舊木板，鋪上一條打滿補丁的舊褥子。他出行也是輕車簡從，只要不出城關，就騎自行車」（中國新聞網 2014）。對於發財，習近平曾於福建省長任內接受訪問並如此註解：「要從政，就是一種事業的追求，就得捨棄個人的私利，不能什麼好處都想得。」（人民網 2015b）。

2007年4月，習近平就任上海市委書記後以幹部作風建設為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文章指出：「加強領導幹部的作風建設，教育是基礎，制度是保證，監督是關鍵。……加強對領導機關、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的監督，加強對公權力大、公益性強、公眾關注度高的部門和資金、資產、資源等關鍵領域的監管，最大限度地堵塞以權謀私的漏洞，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新浪網 2007）。2007年擔任上海市市委書記期間，習近平拒絕總面積超過省部級官員住宅標準的三層英式花園洋房，並且在配車、配廚師和保健醫生方面都恪守標準。同時，習近平拒絕上海市特意安排超過規格的專列，以便他返回杭州和接替浙江省委書記一職的趙洪祝交接業務（楊中美 2011, 167-168；博訊新聞網 2013）。

習近平早在1980年代末期就開始打貪反腐，並非擔任總書記後才有的行為，前後行為的一致性應證他厭惡貪腐的偏好。1988年5月至1990年4月之間，習近平在寧德地委書記任內，曾清查整肅幹部違紀違法大建私房的腐敗事件，把「敢於碰硬，敢攻難點，抓反面典型，拔釘子戶」作為查處的突破口（人民網 2012），並曾主動退了價值60多萬元的禮物（李濤華、胡麗麗 2013, 164）。³ 1990年5月21日《人民日報》以「辦

³ 時任中顧委秘書長的李力安到福建時當面問道：「全省都沒有人退，為什麼只有你退？你為什麼要退？」習近平回答：「退是應該的，我以為大家都退呢。」（歐陽君山 2014）。

好一件事，贏得萬人心」為標題，報導習近平在寧德的反貪行動（人民網 2015c）。⁴一到寧德，習近平就表示：「當幹部的宗旨首先就是講奉獻，就是講服務。」「熊掌和魚不可兼得，當幹部就不要想發財。」「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廉政建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如果我們不能承擔起這種歷史使命，我們就會失去民心。」習近平帶頭身體力行，下鄉吃食堂，交伙食費。時任寧德地委常委、統戰部長姚智梅回憶：「習書記到寧德上任，不僅辦公室是用原來老書記的，而且公務車和司機也都是老書記留下來的。」（人民網 2014a）。1989年3月寧德地委、行署出台《關於地委、行署領導幹部廉潔自律的若干規定》，1989年5月又出台《關於黨政機關廉政建設的若干補充規定》，兩者共17條。這兩個文件正好和2012年12月習近平上台後立刻出台「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前後呼應，反映習近平厭惡腐敗的堅持。⁵

1990年習近平調任福州市委書記後，要求地方幹部遏止公款吃喝玩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歪風，而且「每位市委委員、候補委員，都要堅決執行，率先垂範」。1995年12月當地官方深入市區酒樓和娛樂場所明察暗訪，發現濫用公車等問題，之後還建立規章制度，嚴肅查處違紀人員，防止用公款請客送禮、吃喝玩樂等歪風回潮（人民網 2014b）。以上做法又和習近平上台後的反腐作為相當類似，顯示習近平在作風上的一致性。

三、隱忍堅持、高度自信

習近平雖為高幹子弟，但自幼父親失勢多年，飽嘗家人分離與人情冷暖之苦。青少年與青年時期的習近平在壓力下自求生存，養成隱忍堅持、喜怒不形於色，又有高度自信的性格。同時，早年的政治波折也造成他

⁴ 原文見人民日報（1990），又見人民網（2018b）。

⁵ 關於兩個文件的內容，見人民網（2014d）。

在險境時不輕信他人的心態。就任總書記之後，習近平進行多面向的改革，幅度之大超乎外人預期。一方面反映出他在即位前，特別是在不利環境中，善於隱藏自己的鋒芒；另一方面反映他敢做他人不敢做的事，並能堅持下去的性格。他在推動重要政策時，若遇到阻力會意圖摧毀對手的抵抗，繼續前進，形成在原則性問題上的底線思維。

1962年8月，習仲勳遭誣捲入小說《劉志丹》案，被關押審查，9歲的習近平則經歷被抄家的場景。1966年12月，13歲的習近平被歸類為黑幫子弟，送往中央黨校集中觀察審查，批鬥時被威脅「槍斃夠一百次了」，最後送往少管所黑幫子弟學習班（鳳凰網 年分不明）。1969年1月，16歲的他下放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大隊，從不適應農村生活到適應環境，到擔任支部書記，親自帶領社員下地打井，表現其韌性十足與毅力超群的性格。這段期間，他曾因父親因素申請入團、入黨被退回十餘次（人民網 2018a）。即使在申請到清華大學就讀時，也需要先解決父親的政治問題。習近平自述：「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大公網 2015）。直到他22歲時離開農村，進入清華大學就讀，25歲時父親重新復出工作，才逐漸脫離苦境。

2003年習近平在《福建博士風采》的自述中，回憶七年下鄉的困苦生活。他提到：「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微享群 2018）。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接受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節目採訪，談到在梁家河插隊時的惡劣環境。他說：「當時跳蚤搞得我們痛不欲生。我皮膚過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膿包，全身長瘡啊，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嚴重到我們把六六粉撒到床單上睡覺，否則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後沒事了，硬扛過來了……。」（大公網 2014a）。從習近平的訪問談話

可以看出，當時他在體力與思想上都承受了艱鉅的考驗，文革期間的歷練造就習近平日後面對挑戰與困難時，忍耐堅持、不吃硬的人格特質。⁶

雖然習近平具有忍耐堅持、不吃硬的性格，但也深知在未掌握優勢時，韜光養晦、喜怒不形於色。在下鄉期間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時，做事沉穩、個性低調。梁家河村民回憶：「習近平雖然年輕，但非常穩重，大夥兒在剛開始討論時，他總是不表示意見，靜靜地聽大家各自講完，最後才簡短地敘述自己的想法，他的看法大多成為最後的結論。」（黃怡筠譯、矢板明夫著 2012, 134）。2000年到2002年任職福建省長期間，習近平與時省委書記陳明義合作不順利，但仍保持低調清廉作風（林洸耀 2016, 45）。2007年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半年期間，習近平在公開場合從不多言，除依據指示傳達中央文件外，就是講幾句四平八穩的官話、套話，沒有風采、沒有亮點，但也絕不會有錯（楊中美 2011, 166）。2007年十七大之前，胡錦濤向習近平詢問擔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的意願，習近平的答覆是：「……自己並不熟悉少數民族問題，但是黨怎麼安排，他就怎麼接受。……習近平的低調與隱忍，是其勝出的關鍵。」（林洸耀 2016, 49）。

除了在官場上表現隱忍，習近平面對媒體與朋友也十分謹慎，避免可能犯錯的情境。朋友描述習近平私下聚會時的表現，也說：「習近平只是天南地北地和其他人聊天應和，絕不表示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五個人乾光了將近十瓶六十度左右的白酒，但即使這樣，他到最後還是沒有胡亂說起醉話。在我感覺起來，就算面對朋友，他還是顯得莫名的緊繃。」（蘆荻譯、峯村健司著 2016, 211）。還有人認為，習近平「絕不輕易相信他人，唯有權力才是真理，這是我們這批在文革時期度過青春期的世代共通的價值觀哪！」（蘆荻譯、峯村健司著 2016, 212-213）。隱忍也是大陸

⁶ 2017年4月底有學者在一場閉門座談會中轉述大陸重要智庫主管的觀察。他認為習近平在黨內一貫強調：戰略、辯證、創新、底線四大思維，對台亦是如此。其中的堅持底線即是堅持原則，遇到壓力時不輕易退讓。

流亡海外人士、境外作家與國外記者對習近平的共同評價，如鮑彤、楊中美、林洸耀、王軍濤等人（林洸耀 2016, 30-124；楊中美 2011, 278；吳鳴 2008, 308）。⁷

四、念舊重情、除惡必盡

從早年經歷來看，習近平對老朋友、老同事展現十足情義，定時問候，對曾經提攜愛護他的老長官也是嘘寒問暖不斷。即使朋友或老長官後來失勢，習近平仍舊保持聯絡。此外，習近平也有恩怨分明的特質。對於在政壇上有摩擦的人，習近平會銘記在心。這個心理特質的形成，既跟習近平成長的時代背景有關，也跟他的家庭有關。習近平在肅清階級敵人，改造舊社會的政治氣氛下出生、成長，又經歷文革動盪時代，大時代的背景自然會影響他們這一代人對人際關係的看法，以及政治認知與信念。此外，習近平的家庭生活與教育，特別是習仲勳的爲人，也對習近平產生影響。

由於念舊重情、不信任他人和文革世代對敵鬥爭等經驗的共同形塑，若被習近平認爲是「我群」成員，習近平會委以重任，不次拔擢。若是被認爲是「敵群」成員，習近平則會除惡必盡，消除其影響。若屬於非「我群」和「敵群」的「他群」成員，則首先抱持懷疑心態，但端視他們的表現與效忠程度，決定是否納入我群。這種恩怨分明，除惡必盡的性格是習近平上台後大量提拔浙江、福建、上海、南京軍區等地出身的幹部或將領，同時對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勢力除惡必盡的原因之一。

習近平是典型的文革世代（或稱共和國同齡人）。文革世代的人在就學期間，經歷紅衛兵運動、上山下鄉運動，以及改革開放，對他們的性格與作風造成一定影響，形成集體記憶。受到當時階級鬥爭教育的影響，他

⁷ 2016年1月訪談。

們認為階級鬥爭無所不在、無處不在，且鬥爭會越演越烈，因此對他人先抱持懷疑態度，缺少信任感。階級敵人以各種形式和手段妄圖破壞社會主義。一旦認定是階級敵人，必須實施專政手段對待這些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這種觀念既存在於學校教育中，也存在於社會生活中。因此出現他們「對敵狠，對友（同志）和」的階級情感（米鶴都 2011, 63-64, 328）。習近平成長於文革期間，在他的行事風格中也透露出這種「對敵狠，對友和」的特質。

此外，受到父親作風的薰陶，習近平具有念舊寬厚的性格特質，對老幹部與朋友的禮數相當周到（習仲勳傳編委會 2014, 597-599）。1986 年習近平前往廈門大學對台問題研究所，碰到陝西老鄉時，操著一口流利地道的陝西話提到：「我習近平沒有忘了家鄉。父親說人什麼都可以丟棄，唯獨不能丢了鄉音；人什麼都可以忘記，就是不能忘了家鄉、忘了根。」（吳鳴 2008, 140-141）。⁸習近平離開河北省多年，許多正定縣老幹部和舊部每年還收到他的新年賀卡。習近平曾撰文指出，他離開正定縣到福建工作後，時時常惦記著摯友、正定縣文化局原局長賈大山。「每次見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請他們給他帶去一些薄禮。每年春節前夕，我總要給他寄上一張賀卡，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願」。1995年和 1997 年賈大山罹病到過世前，習近平兩度回正定縣探視他（中國共產黨新聞 2014）。⁹習近平念舊的特質還可以從他對待呂玉蘭（失勢降調正定縣委副書記，與習近平同事。晚年生病時，習近平從福建前往河北親赴醫院探視）（吳鳴 2008, 109-110）、呂侯生（陝北插隊時的農民好友，曾一起吃飯、蓋同一條被子。後來生活困苦，健康不佳，習近平兩度出錢接他

⁸ 心靈苦渡，〈習近平印象〉，轉引自吳鳴，《習近平傳》，頁 140-141。原引述文有誤，對台研究所應為台灣研究所。該所已升格為台灣研究院。

⁹ 〈憶大山〉是 1998 年習近平寫的一篇敘事性散文，最先發表在《當代人》（1998，第 7 期）。2014 年 1 月，〈憶大山〉一文的責任編輯康志剛將該文重新發表在博客上，隨後被《光明日報》轉載。

到福州看病）（大公網 2014b；秦雨霏 2012）、項南（原福建省委書記，是習近平長官，後來被保守派逼迫下台。習近平繼續問候探望，至他過世為止）的方式看出（吳鳴 2008, 133-134；黃怡筠譯、矢板明夫著 2012, 159）。

此外，習近平善於經營人脈，對老幹部禮數周到，也顯示其念舊重人情的一面。每到一個單位，習近平一定探視省內的副部級以上老幹部，請求幫忙與建議，還會詢問他們的子女是否需要照顧。從在福州開始這一套經營人脈的手段就很成功，讓他在黨內測驗中獲得支持。¹⁰

習近平儘管念舊，但也有恩怨分明的另一面。他看起來敦厚，但有仇必報，除惡必盡。許多人都對他的強勢領導印象深刻。前軍委秘書長、國防部部長耿飄長女耿瑩在談論習近平時提到：「他眼裡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頭，而且他疾惡如仇，性格非常堅韌。」（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6）。習近平在河北省正定縣工作期間，與時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高揚相處並不好。¹¹高揚後來位居中央黨校校長要職，並且是中顧委委員，但2009年他去世時，時任政治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沒有依慣例出席其遺體告別儀式（明鏡雜誌 2013a；林洗耀 2016, 44）。前述案例只算是「人民內部矛盾」，習近平的回應也較為緩和。在處理「敵我矛盾」時，習近平立刻顯現面對階級敵人絕不手軟的作風。周永康等新四人幫的被清洗，則是習近平對待敵人的做法。

五、崇尚強勢領導、不墨守成規

受到早年政治社會化的影響，習近平效仿毛澤東的強勢領導，自認有

¹⁰ 2016年1月訪談。

¹¹ 習仲勳曾打電話給高揚，請省委關照習近平，高陽當眾公開此事，後來習近平轉往福建工作，辭行時又被高陽調侃。高揚也多次表示習近平太年輕，中央如此迅速地提拔習近平是「不正之風」（明鏡雜誌 2013b）。

「治國天命」。一旦做出重大決定，就會極力推行下去，掃除障礙。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習近平一方面受到文革集體記憶的影響，一方面受到紅二代身分的影響。這種強勢特質在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後表現得最明顯。

文革世代的人除了具有「對敵狠，對友和」的集體特徵之外，還有「崇拜權威，敢於造反」的世代特質。他們成長於崇拜毛澤東的時代，先以做毛主席好孩子為目標，最後發展到建立紅衛兵組織，捍衛紅司令——毛澤東。這個過程讓他們形成崇拜權威、遵守權威，又希望自己成為權威，要求別人服從自己的世代特徵。同時，他們敢於造反，成長過程中鬥爭過的對象依次是學校師長、四舊、階級成分不好的同學和老幹部。隨著個人迷信的幻滅，他們率先起來反抗毛澤東的代言人——中央文革小組，以致最早對文革路線提出了質疑（米鶴都 2011, 22, 38, 164, 329）。

對高幹子弟來說，他們還有一種優越感或責任感，他們自認根正苗紅，抱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基本如此」的觀點，理當接班（米鶴都 2011, 82, 112, 121）。換言之，不少紅二代抱持血統論的價值觀。在江澤民跟胡錦濤的時代，紅二代覺得受到壓抑，有焦慮感。自許具有「治國天命」和「造反起家」的經歷讓他們掌權之後表現出強勢領導，當仁不讓的企圖。習近平是典型的高幹子弟掌權，又在造反的大時代中成長，自然形成崇尚強勢領導、不墨守成規的行事風格。¹²

習近平在1980年代就曾經打破用人成規，顯示其不墨守成規的行事風格。1982年冬，時任正定縣縣委書記的習近平遊說作家賈大山出任該縣文化局局長。由於賈大山不是中共黨員，習近平和縣委破例讓文化局不設黨組，人事任免可以在局長辦公會上議決以便於工作。這在當時的縣級政府部門中是很少見的情況（人民網 2014c）。

1988年至1990年習近平在寧德推動反腐整風，也說明他的強勢領導

¹² 前述大陸智庫主管描述習近平的四大思維中，創新思維即指習近平不墨守成規，屢有新意出現，做他人不敢做的事情。

與堅毅性格。當時他清查幹部占房情況時，受到各種阻力和困難。有人勸告說，全區涉入的幹部多，相當部分是科處級幹部，人際關係複雜，牽涉面廣，難度大，暫時不抓為好。習近平表示：「我就不信，各級黨委下定決心，放手發動群眾，會有辦不成的事！」時任寧德地委副書記鐘雷興回憶，習近平在地委工作會上嚴厲批評部分幹部的畏首畏尾，並指出：「這裡有一個誰得罪誰的問題，我們是得罪幾千名幹部，還是得罪幾百萬群眾？！」截止1990年底，全地區共清退公房1,982戶，清退面積8萬8,411平方米。全地區共查結違法違紀占地建房幹部3,782人，其中處級99人，科級476人，給予經濟處罰3,446人，收回補罰款198.03萬元（福建日報 2014）。2009年12月，習近平以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身分正式訪問日本3天，強約日本天皇「特例會見」（黃怡筠譯、矢板明夫著 2012, 31, 35；蘆荻譯、峯村健司著 2016, 233-235；楊中美 2011, 230-231）。¹³這次特例會見等同逼迫本改變天皇會客的規則，顯見習近平的強勢風格。不過，在擔任福建省省長、浙江省委書記和上海市委書記期間，這種強勢領導的特質就不太明顯，反而是呈現隱忍低調的特質。

六、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

從家庭教育和求學背景中可以看出，習近平具有很強的集體主義信念。習近平上台後不斷強調中國夢、民族偉大復興、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等目標，實際上正反映出集體主義至上的政治信念。按照習近平抱持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習近平會持續強調黨員幹部為黨奉獻，要個別民眾（小我）為中共為國家、社會（大我）設定的目標而犧牲個人權益。強調集體主義的信念源自中共的意識形態與他從小的家庭與學校生活有關。這

¹³ 習近平訪問日本時，中國外交部比照的標準是1998年4月胡錦濤以中共第四代接班人和國家副主席訪日時，被安排與日本天皇會見。此會見達成胡錦濤接班地位穩固，受到日本高規格接待的輿論效果。

種出自集體主義的政治目標跟台灣強調個人主義的訴求背道而馳，是造成兩岸民眾無法熟悉對方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原因。

崇尚集體主義也是文革世代的人擁有的世代特質，甚至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價值。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指犧牲小我利益，以維護大我利益。在政治上，集體主義體現在強調家國利益優先，個人權利居次（季乃禮 2010, 68）。習近平身為高幹子弟，從小又過著集體的寄宿生活，更容易受到這個特質的影響。米鶴都（2016）指出：「紅衛兵一代的一個文化特點，是強調集體主義精神，這點上，幹部子弟也表現得更強烈。……而幹部子弟寄宿學校的管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盛行集體英雄主義的年代，這一代大院子弟往往比市民階層更注重集體精神。集體主義的教育，寄宿制學校培養的團隊精神，父母和家庭間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強調整體的榮譽感，是大院子弟們突出的特點。」習近平自就讀「紅色搖籃」的北海幼兒園（于陸琳 2004），¹⁴便開始寄宿生活，逢年過節才回家。幼兒園畢業之後，隨即踏入有「紅色貴族學校」之稱的北京八一學校，開始另一段同年寄宿生活（李濤華、胡麗麗 2013, 29；楊中美 2011, 54）。寄宿學校強調「集體第一、個人要從屬於集體」的嚴密軍事化管理，強化住校生的情感連結，再加上幹部子弟的父母大都有革命經歷，無疑對習近平產生深刻的影響。「大院文化」崇尚的犧牲精神，不僅在習近平的政治性格留下重要痕跡，更由此延展出「團結」與「群眾」的集體主義理念。

除了寄宿制與學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同時加強了習近平的集體主義觀。2002年習近平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文中也提到：「父親講的團結方面的道理，當我們後來生活在集體環境時，體會就很深刻了。無論是上寄宿學校，還是下鄉和參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較好；凡事團結處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別是後來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人民網

¹⁴ 參見齊心（2012）。

2015d; 2015a）。由此可見，習仲勳在習近平的人格培養方面，一再的灌輸並強調團結的重要性。

從政後，習近平多次於公開場合強調集體主義的重要。2000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談論自己對於從政之路的抱負與理念，多次提到其重視集體與團結的價值觀：「世界上是沒有至善至美的東西的，你把一個人寫得完美了，人民就不相信了。同時，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離開人民群眾，離開領導集體，你將一事無成。」「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美德，共產黨人最講究集體主義精神。」（人民網 2015b）。習近平也分享自己在插隊期間，一開始只想逃回家，後來努力跟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一起幹活、一起生活，體會到和群眾融為一體的充實感。在工作方面，他剛接任福建省代省長時表示：「首先要認清大前提，是在省委領導下開展工作；同時還要看到，省政府裡面有省長、諸位副省長和諸多的政府成員單位，大家形成合力，才能幹好工作。除此之外，還要靠全社會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所以，我們一直強調集體主義精神，這正是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所在，也是我們共產黨人一貫堅持的優良作風。」（人民網 2015b）。

七、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使命感

受到早年成長經驗的影響，身為高幹子弟的習近平抱持強烈的「紅朝」情節和使命感，要完成父執輩留下的革命事業。從他一上任就提出「中國夢」，到十八屆六中全會獲得核心稱號之後，被詮釋成民族復興偉業的引領者、設計者和執行者，其實都反映出他內心世界的自我期許。這種歷史使命感的根源，來自清末以來受到列強侵略的「百年屈辱」，進而結合中國共產黨早年革命的目標。在大時代和家庭教育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習近平自認是父執輩革命事業的繼承人，把自己的存在意義鑲嵌到前述的集體目標之下。在這種使命感的推動下，習近平將繼續推動大規模變革，同時在涉外事務表現強勢作為。

文革世代的人擁有的三個世代特質，就是復興中國的情懷與抱負。

這種使命感源自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孕育產生的理想主義——既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宏願，也不乏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此外，高幹子弟自認根正苗紅，具有把國事視為家事的優越感。這和一般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同，他們的責任感是對父輩的事業、理念的投入（米鶴都 2011, 1, 82, 164）。

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恰恰符合這種民族復興和改造中國的使命感。「習近平堅信自己可以跟毛澤東那個時代一樣，用社會主義改造中國、改造全世界，這跟他現在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的想法一脈相承。……他也沒有那麼大的包容力，包容異己，所以對內對外他都要塑造成強大的領袖。加上現在中國有錢了，覺得各國要來低頭，所以堅信改造中國社會、改造全世界是可以達到」¹⁵。

這種使命感一方面是承襲父執輩的革命事業而來，希望在他手上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則建立在民族主義之上。習近平曾經表示說，小時候平時住校，逢年過節回家後，子女們都是先在牆邊站一排，聽父親的訓話。「也就是講他自己怎麼參加革命，你們今後一定也要革命，革命是怎麼回事，我們聽得耳朵都起繭子了，有的時候很想去玩，很不耐煩，但是不敢不聽，這些東西也就潛移默化」（鳳凰網 2009）。

2002年10月習近平就任浙江省代省長後，一週後就前往浙江嘉興南湖的「紅船」朝拜，因為中共曾在此處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嚴紅楓 2017）。2007年3月24日習近平調任上海市委書記之後，30日就率上海市委同仁瞻仰中共一大、二大會址，作為他首度公開亮相的場合。藉此樹立自己根正苗紅的正統形象，並顯示「對黨的事業忠誠」（餘瑋 2007）。習近平在擔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時，在《浙江日報》上開始發表專欄，署名「哲欣」，爾後《浙江日報》將所有專欄文章編輯成冊，命名為《之江新語》。《之江新語》每一則專欄文章的文字不多，但深切重點、語意鮮

¹⁵ 2016年1月訪談。

明，像是舉起一把立志國家富強的旗幟。內容不外乎治國理念、大政方針等，已突顯豪情壯志（習近平 2007）。2017年10月31日，十九大閉幕一週之後，習近平帶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專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瞻仰中共一大會址和嘉興紅船。由於前往革命聖地緬懷革命精神與事蹟已成為習近平的固定行為模式，反映他對民族復興和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重視。

此外，習近平的敢講、敢幹、敢於擔當的大國氣派與民族主義情緒經常在涉外場合中出現。2009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墨西哥，在與當地華僑見面時脫稿說出：「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有些吃飽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央視網 2009）。從這些早年的言行內容來看，不難發現他抱持的使命感和民族主義。

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後，就不斷強調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主旋律。2012年11月29日，就任總書記不到半個月的習近平帶領其他政治局常委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並定義其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2013年3月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中的講話裡，九次提到「中國夢」（新華網 2012; 2013），並提出「正能量」一詞，為實現「中國夢」提供精神動力（林洸耀 2016, 41）。¹⁶ 2016年10月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後，六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赴各地巡迴宣講時表示，六中全會的最大成果就是確立習近平的黨內「核心」地位。中共中央已對「習核心」的表述做出官方版本，稱他是全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的核心。其中對於「行動上的核

¹⁶ 「中國夢」的核心目標可以概括為「兩個百年」，即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時，逐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表現在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途徑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弘揚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實施手段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百度百科 2022）。

心」解釋稱，習近平「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民族復興偉業的設計者、引領者，也是知行合一的行動者。」（明報 2016）這種一上任就強調革命傳承或歷史使命感的做法，是習近平仕途一路走來的習慣性舉措。在他就任總書記之後，持續推進內心世界的自我實現。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建黨以來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主要內容就中國共產黨自我總結的在該黨建立一百年歷史中的各項成就以及經驗、挫敗、教訓等，並高度肯定習近平執政以來的各項深化改革開放的政策（新華網 2021）。這個決議正式把中共歷史斷代成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三個時期。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在延續鄧小平，稱不上一個時代。由此可見，習近平自比毛鄧的心態，而將自己鑲嵌到中共黨史當中，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在內部講話中明確指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2013年1月5日習近平（2019）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中，他指出：「我們現在的努力以及將來多少代人的持續努力，都是朝著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前進的。……如果丟失了我們共產黨人的遠大目標，就會迷失方向，變成功利主義、實用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我們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占據優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鬥爭的各方面準備。」「我們必須有很強大的戰略定力，堅決抵制拋棄社會主義的各種錯誤主張，……不斷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不斷為我們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這篇講話是在習近平2012年11月上任不久之後，在中央黨校向新進中委和候委宣講十八大精神的時候提出。同時，這篇講話雖然在2013年1月提出，但直到2019年3月才在黨的理論性刊物刊登。習近平在一上台的時候就對黨內菁英談路線問題，等到美中關係滑向修昔底德陷

時在最重要的理論性刊物發表，其重要性非同小可。他的講話充分反映「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衝突」的認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長期競爭，而且社會主義終將獲勝。在這篇講話中，吾人可以找到習近平對美中關係的基本態度，以及中共強勢外交的決策心理基礎。在對台問題上，習近平是大開大合的領導人，要看實質性的問題，不在乎台灣是哪一黨和哪一派在位，也不會像胡錦濤一樣刻意討好台灣民意，讓利於台灣。這跟他有歷史觀和大戰略有關。¹⁷

八、結語

本文嘗試根據公開資料，從習近平早年經歷與言行中勾勒其特點，並從中擷取出涉及政治認知、政治信念與行事風格的心理特質。本文提出，習近平具有下列政治性格與領導風格：1.簡儉樸實和厭惡腐敗；2.隱忍堅持、高度自信；3.念舊重禮、除惡必盡；4.崇尚強勢領導、不墨守成規；5.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6.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使命感。若從世界觀、歷史使命和行事風格三個面向剖析這六點心理特徵之間的關聯性或深層意義，可以得到下列觀察。

首先，在習近平的世界觀中，認為衝突是政治的本質，合作則是次要的。「簡儉樸實、厭惡腐敗」、「隱忍堅持、高度自信」、「念舊重情、除惡必盡」、「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使命感」四項特質指涉國內外政治中的衝突面，堅持鬥爭贏得勝利，因而透露他的政治認知的根本。其中「簡儉樸實、厭惡腐敗」涉及國內政治中廉潔與腐敗的對立。對習近平來說，腐敗是敵我矛盾，對「敵群」需要專政手段鎮壓。這又涉及善與惡、對與錯的標準。「隱忍堅持、高度自信」是指在衝突或挑戰中處於劣勢時，善於隱藏鋒芒，讓人不易察覺自己真實立場，爭取贏得鬥爭的最後

¹⁷ 前述大陸智庫主管描述習近平的四大思維中，戰略和辯證兩種思維與此處所說的歷史觀和大戰略有關。

勝利。經過許多困苦之後，習近平培養出高度自信心，不怕未來面對困難與挑戰。「念舊重情、除惡必盡」反映對待「我群」、「敵群」的方式，自然反映在習近平的政治認知中，政治本質是以衝突為主。這樣的辨認敵我群體的方式若延伸到國內政治當中，就容易形成重用親信，整肅政敵與貪官；若擴大到國際政治，就會成為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之爭的區分敵我的認知。「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使命感」跟中國清末以來的百年屈辱直接相關，自然聯想到「東亞病夫」與列強的對立衝突（民族主義面向），或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意識形態面向）的二元世界觀，只是更著重於弱者由弱轉強，得以平視列強的崛起。習近平希望完成父執輩未完成的革命事業。

這種認知影響他對國際政治、國家社會關係、黨內政治，以及人際關係的看法，構成他的世界觀。在文革期間，習近平父親、家人和自己都受到政治迫害，再加上從小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階級鬥爭觀念。因此，習近平缺乏安全感，認為在原則問題上的政治衝突是零和遊戲。只有牢牢握有權力才能保證自身安全，才是最佳的生存之道，而妥協只是暫時性、策略性的退讓。在尋求權力的時候，可以低調內斂，使用權力的時候，卻高調張揚。這個認知直接影響他在任內展現的以權力集中為主要特徵的內政作為，包括小組治國、反貪肅敵和重用舊部、黨委擴權、遏制公民社會萌芽，以及不再「韜光養晦」，改採強勢外交（assertive diplomacy）為主軸的外交作為。¹⁸

其次，在習近平的政治信念中，他相信他的歷史角色是完成民族偉大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使命感」兩項特質彼此相通，是習近平政治信念的一環。前者是為了集體目標，可以犧牲個人權益，後者則是具體化的集體目標。換言之，在習近平的信念中，為了完成中共當初的革命目標，可以具

¹⁸ 有關近十年中共政治發展呈現「強人政治」、「黨委擴權」、「國家控制社會」的特徵，見Kou（2021）。

正當性的犧牲他人或部分民眾的權益或驅使他們自我奉獻。然而，過度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容易導致小我利益不可挽回的損失。這是理想主義過於濃厚後產生的副作用。

政治信念中的理想主義和集體主義信念源自從小的家庭生活、寄宿生活與下鄉經驗，以及文革世代的集體記憶。開國元勳子弟的血統更讓他自認有治國天命與責任，運用中共的領導地位完成他的歷史任務。因此，他不可能接受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西方民主政治。習近平上台後強調黨的領導、限縮社會多元聲音的表達空間、將防疫的清零政策昇華到制度優越性之爭、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路線之間的長期鬥爭、對台加強施壓等作為莫不與此有關。

最後，習近平自信力強，崇拜強勢領導。「隱忍堅持、高度自信」、「崇尚強勢領導、不墨守成規」兩個特質都和習近平的領導風格有關。習近平把自己的歷史使命鑲嵌到前面提到的完成民族復興和革命事業之後，自認具有高度的「治國天命」，意圖打破阻擋在他前面的各種制度框架與權力格局。

習近平深受父親被鬥失勢之苦，歷經文革的磨難及知青上山下鄉的經驗。青少年時期的他在文革初期受到批鬥，其後下鄉插隊、申請十餘次後才順利入黨。這段經歷培養出逆境生存的性格，下鄉經驗讓他們理解社會底層之苦與政治運作之殘酷。從習近平實際作為上看來，他的行事風格傾向「不吃硬」。習近平在毛澤東時代成長，效法的對象是強勢領導，便於完成父執輩留下的革命大業與社會主義建設，而非集體領導。面對挑戰與壓力時，往往採取堅持底線的回應做法。持續反貪肅敵、破格重用親信舊部、小組治國、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建立政治局成員向黨中央和總書記述職與工作報告制度、強調黨的全面領導、推動軍改，落實軍委負責制、壓縮國務院總理的決策權、透過國家機器和科技壓制公民社會萌芽、強勢回應美中競逐態勢，以及堅持清零防疫等的做法上都可以看出他的堅持底線、高度自信、強勢領導與不墨守成規的行事風格。

本文的分析雖然偏向詮釋和歸納，從實證主義的角度來看，會讓人覺

得推論較為主觀。不過，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針對習近平公開講話中「鬥爭」一詞，進行共現詞分析與情緒分析，其結果是呼應本文歸納出的六點言行風格特徵。¹⁹ 當然，本文的分析仍有其侷限性。就算早期言行反映出當時的政治認知與信念，過度強調領導人前後認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仍會出現誤判的風險。官式採訪甚至會出現美化領導人的情況，致使真實面貌變得不清楚。其次，由於體制封閉性的關係，蒐集中共領導人經歷和言行成為艱鉅的工作。特別是在習近平時代，中共經常清理網路資訊，因此蒐集資料時容易發生疏漏。外媒的報導有時會出現可靠度不一的問題，雖然盡量多方比對查證，但有時仍得使用「孤證」。第三，如同白魯恂（Lucian W. Pye）（劉憲閣譯、白魯恂著 2009）曾說的，心理學家經常無法回答「有許多人存在著類似的個人經歷，卻沒有引起同樣的公共效果」的問題，本文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變數太多，個案太少」的現象使得本文的結論都是暫時性的觀點。最後，領導人的心理特質只是影響決策的一環，而非全部，因此國內外客觀環境的變化仍是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

參考書目

一、中文

人民日報，1990，〈辦好一件事，贏得萬人心——福建寧德地區查處幹部違紀建私房紀實〉，5月21日。

人民網，2012，〈習近平的反腐觀：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http://fanfu.people.com.cn/n/2012/1228/c64371-20048078.html>。

人民網，2014a，〈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習近平同志在福建踐行群眾路線紀事（8）〉，<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4/1030/c1001->

¹⁹ 見Kou（2021）。

- 25938644-8.html。
- 人民網，2014b，〈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習近平同志在福建踐行群眾路線紀事（10）〉，<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4/1030/c1001-25938644-10.html>。
- 人民網，2014c，〈父親和習主席的深厚情誼〉，<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217/c1001-24382426.html>。
- 人民網，2014d，〈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習近平同志在福建踐行群眾路線紀事（9）〉，<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4/1030/c1001-25938644-9.html>。
- 人民網，2015a，〈習近平、王岐山、路遙、史鐵生……他們是同一批知青〉，<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08/c1001-26655870.html>。
- 人民網，2015b，〈習近平14年前受訪談如何跨入政界：立志當公僕做大事（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09/c1001-26356880-2.html>。
- 人民網，2015c，〈從在寧德審查幹部私房看習近平治國理念〉，<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23/c1001-26588910.html>。
- 人民網，2015d，〈習近平自述：永遠是黃土地的兒子〉，<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14/c1001-26567403.html>。
- 人民網，2018a，〈習近平和他的父母〉，<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8/0220/c1001-29826529.html>。
- 人民網，2018b，〈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工作時反腐倡廉的生動實踐——回憶1990年我的一次採訪〉，<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8/0302/c1024-29842665.html>。
- 于陸琳，2004，〈創辦北海幼兒園〉，<http://www.cclawnet.com/zongheng/zonh2004/zonh20040313.html>。
- 大公網，2014a，〈習近平7年知青插隊歲月：村民稱 聽其叫過苦〉，http://news.takungpao.com/history/redu/2014-06/2571385_3.html。
- 大公網，2014b，〈情義無價，習近平與他插隊時的農民好友呂侯生〉，

- http://news.takungpao.com/history/redu/2014-06/2571349.html。
- 大公網，2015，〈國家領導人的清華歲月〉，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topnews/2015-04/2984849_wap.html。
- 中國共產黨新聞，2014，〈習近平：憶大山〉，<http://cpc.people.com.cn/n/2014/0113/c64094-24097950.html>。
-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6，〈耿瑩談習近平：他清楚祖國要什麼〉，http://hk.crntt.com/doc/1042/6/4/0/104264000_2.html。
- 中國新聞網，2014，〈賈大山之子講述父親和習近平的情誼：一聊半宿〉，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2-17/5846816_2.shtml。
- 央視網，2008，〈習近平副主席在延安插隊的日子〉，http://big5.cctv.com/gate/big5/news.cctv.com/science/20081219/103694_1.shtml。
- 央視網，2009，〈習近平痛批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指手畫腳〉，<http://news.cctv.com/china/20090213/102301.shtml>。
- 百度百科，2022，〈中國夢〉，<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17221/9342599.htm>。
- 米鶴都，2011，《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米鶴都，2016，〈紅衛兵運動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https://news.ifeng.com/a/20160206/47380745_0.shtml。
- 吳鳴，2008，《習近平傳》，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
- 李濤華、胡麗麗，2013，《習近平大傳》，台北：領袖出版社。
- 李巍、王勇，2006，〈國際關係研究層次的回落〉，《國際政治科學》，6（3）：112-142。
- 季乃禮，2010，《政治心理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
- 明報，2016，〈特稿：官方稱習「三核心」首提「民族復興引領者」〉，http://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1111/s00013/1478801066489。
- 明鏡雜誌，2013a，〈習近平對高揚『君子報復，25年不晚』？〉，<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magazine/news.aspx?ID=M000000208>。

明鏡雜誌，2013b，〈河北省委書記高揚對習仲勳父子不給面子〉，<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magazine/news.aspx?ID=M000000199>。

林洸耀，2016，《把脈中國：對習近平的第一手觀察》，台北：天下文化。

秦雨霏，2012，〈德國明鏡：習近平與薄熙來早期人生截然相反〉，<http://www.epochtimes.com/gb/12/10/22/n3711209.htm>。

寇健文，2010，《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修訂3版，台北：五南。

習仲勳傳編委會，2014，《習仲勳傳》，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習近平，2007，《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習近平，2019，〈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9/0331/c1024-31005188.html>。

博訊新聞網，2013，〈從上海到北京習近平貼身秘書只有鐘紹軍〉，<https://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3/07/201307110449.shtml>。

黃怡筠譯、矢板明夫著，2012，《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台北：天下雜誌。

微享群，2018，〈習近平：我的自述（全文）原載于福建博士風采〉，<http://www.weixiangqun.net/article/3930/>。

新浪網，2007，〈習近平：防止領導幹部成為制度破壞者規避者〉，<http://news.sina.com.cn/c/2007-04-17/015612792942.shtml>。

新華網，2012，〈習近平：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

新華網，2013，〈特寫：習近平九提『中國夢』〉，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7/c_115054547.htm。

新華網，2021，〈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11/16/c_1128069706.htm。

楊中美，2006，《習近平：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共新領導人》，台北：

時報文化。

鳳凰網，年分不明，〈習近平年譜—1954-1968年：出身紅色家庭少年歷盡政治風波〉，<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gong18da/changwei/xijinping.shtml>。

鳳凰網，2009，〈情義無價習近平和他插隊時的農民好友呂侯生〉，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mingrenlu/200911/1102_6855_1415139.shtml。

齊心，2012，〈習近平父親從嚴教子揭秘習近平家風（12）〉，<http://edu.people.com.cn/n/2012/1115/c1053-19593962-12.html>。

劉憲閣譯、白魯恂著，2009，《毛澤東的心理分析》，香港：時代國際。歐陽君山，2014，〈習近平是誰——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開篇〉，《成報》，<https://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3/201403282303.shtml>。

餘瑋，2007，〈習近平：從黃土高坡到中南海〉，<https://blog.xuite.net/fong551/twblog/124598703#>。

嚴紅楓，2012，〈習近平父親從嚴教子揭秘習近平家風（12）〉，http://theory.cyol.com/content/2017-11/02/content_16648914.htm。

蘆荻譯、峯村健司著，2016，《站上十三億人的頂端》，新北：聯經出版。

二、英文

He, Kai and Huiyun, Feng. 2013. “Xi Jinping’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3): 209-223.

Isaacson, Walter. 1992.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Kou, Chien-wen. 2021. “The Reshaping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under Xi Jinping’s Rule: A Strong State Led by a Political Strongman,” the Chinese

- Council of Advanced Policy Studies, Taipei, October 29.
- Lampton, David. 2014.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Sangkuk. 2017.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105): 325-336.
- Lee, Tony C. 2018. “Can Xi Jinping be the next Mao Zedong? Using the Big Five Model to Study Politic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3(4): 473-497.
- Li, Cheng. 2016.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R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US: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 Pei, Minxin. 2018. “China in 2017: Back to Strongman Rule.” *Asian Survey*, 58(1): 21-32.
- Shirk, Susan L. 2018. “China in Xi’s ‘New Era’: The Return to Personalistic Ru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9(2): 22-36.
- Torigian, Joseph. 2018.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Leaders’ Worldviews: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and Xi’s Learned (and Unlearned) Lessons.” *China Perspectives*, 2018(1-2): 7-15.
- Waltz, Kenneth. 2001.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